

《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形象解析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5 年 10 月,故宫博物院定制了专门的展柜,将总长五米多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全部展开,呈现给观众。笔者与学界友人一起观摩了这幅珍贵的画卷。但展室内观者排成长龙,虽然我们有幸被特许在画卷前面多停留了片刻,也无法仔细观察那上面八百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是我去参观的主要目的。好在故宫方面早就理解像我这样的参观者的心情,用极其高精度的数码摄影技术,将全卷摄制成数字图像,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展室的电脑屏幕上,清楚地看到画卷上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友人在数点着上面的女性人物,而我则想看看上面到底有没有胡人,因为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包括唐朝东西两京的粟特胡人。

《清明上河图》中的唯一胡人

我们从长卷的开始部分仔细观察,远郊的行旅,河岸边劳动的人群,热闹过桥场面中嘈杂的人众,城内外酒楼、店铺、宅院内外和街道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我们借助电脑的放大技术,对于这些人物形象一一审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物,不论从服饰还是面相,都不能看作是深目高鼻、奇装异服的胡人。在即将没有信心的时刻,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那座雄伟的城门时,眼前为之一亮,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驶的骆驼,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驮囊,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于是,我们的目光很快集中到城门前中心位置的那位牵驼人的脸上。他的穿戴和旁边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那突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窝,高翘的鼻梁,厚重的嘴唇,都让我们不得不把他和周边的汉人区分开来。我想这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虽然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的典型,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胡人,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而且也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的商品上,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定画家张择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

《清明上河图》中的这个胡人,左手抬到肩的位置,大概是牵着缰绳;右手指向前方的道路,似乎在吆喝前面的人闪开,有驼队经过。他的身后是一匹高大的骆驼,大半个身子已经从城门中显现,背上驮着货物。在城门的另一侧,有一峰骆驼的头部已经被城墙挡住,但大半身露在外面。另外还有两峰骆驼跟在后面,身上也都驮着货物或者架子之类的东西,也可能是旅途中的用具。从骆驼的步伐上看,行驶缓慢,好像驮载的货物很沉。驼队行走的方向是走向城外,好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骆驼和胡人,原本都不是中原城市中的主要形象,但是随着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发达,这种形象逐渐被中原汉人所熟悉。过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表现异域风情的陶制的胡人俑和载货骆驼,无疑是丝绸之路胡商贸易给中原人带来的深刻印象的反映。牵着骆驼的胡人形象,应当是当时唐朝许多地方都能够看到的景象。

从公元 3 世纪以来,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胡人构成的商队,牵着他们的运载工具——骆驼、马、驴,驮载着各种珍稀物品,如香料、珍贵药材、金银器、玻璃器皿、珍禽异兽等等,从中亚来到中国,在丝路沿线的城市中兴贩贸易,唐代首都长安的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的南北两市,应当是这些胡商集中的地方。

笔者曾经根据传统文献、出土文书、石刻碑志、图像材料等,勾勒出从粟特商人的本土索格底亚那,经西域、河西走廊,一直到东北营州,以及流寓江南的粟特商人的行迹,并且根据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粟特系统石棺床图像,分析了以粟特商人为首的粟特商队的人员构成、驮载牲畜的种类等情况。

可以说,《清明上河图》上的胡人牵驼图像,应当也是表现的丝绸之路的情况,并且把这个形象放在整个画卷的重要位置——城门的地方。然而,这里的胡人牵驼图是否就是北宋汴梁城社会面貌的真实表现呢?

相同场景下的唐都长安的街市

我们先以唐朝都城长安为对照物,看看相同场景下与北宋都城汴梁的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就是看看唐长安城中胡人应当出现的场所在宋代东京汴梁城中是否也有同样的现象。

《清明上河图》所绘城门内外,都有一些表现集市的场景,在街道两边,有酒店(正店、脚店均有)、香药铺、医药铺、邸店、卦肆、衙门、寺院等等,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买卖、饮酒、算命……但是,在这些嘈杂的人众当中,没有看到一个胡人的模样。

如果我们走进唐代长安的西市街区,那显然是另一番景观。胡人在西市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过去,前辈学者已经从唐代典籍中,找到许多有关胡人在西市寻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胡人以惊人的鉴赏能力,在嘈杂的市场中发现极其珍贵的宝物。比如《酉阳杂俎续集》五《寺塔记》上“菩提寺”条所记宰相李林甫赠予寺僧的一件宝物,后被寺僧携至西市,示予商胡。商胡见之大惊,以一千万市(买)去,僧人问实为何物,胡人曰:“此骨宝也。”同类故事的流传,透露出长安西市有不少经营珠宝的商胡。玄宗时人元澄所著《秦京杂记》,提到西市有波斯客。牛僧孺(779—847)著《玄怪录》卷一“传奇”中,记长安西市有“波斯邸”,即波斯人经营的邸店。

如果说唐代传奇还有一些杜撰的因素,我们或许不能肯定故事中的胡人是否真实的存在。但20世纪初叶以来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印证了西市周边居住的胡人的真实存在。比如醴泉坊的胡人安令节,其墓志记:“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开北阮之居,接南邻之第。翟门引客,不空文举之座;孙馆延才,还置当时之驿。金鞍玉帖,连骑而不以骄人;画卯乳钝,陈鼎而未为矜俗。加以冯良居室,端肃如对于严宾;仇览定交,矜庄岂闻于蝶狎。义之所去,纵千乘而犹轻;道之所存,虽一介而犹重。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岂独柳市万章,贵人争揖,茂陵原口,羣萃公慕之。”据此可知,居住在西市边上的安令节,已渐染汉风,他一边雅好儒业,一边又经商致富,应当说是入居长安的一位亦儒亦商的粟特人,他像《世说新语·任诞》所说的阮仲容道北的诸阮一样,所居宅第广阔,接南邻之第;其门庭如《史记·汲郑列传》所说的翟公之门,宾客阗门;其家富有,出入则金鞍玉帖,连骑而行,仗义疏财,纵千乘而犹轻,颇有侠士风格;因此,“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安令节可以说是居住在西市周边并经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的代表。

其实,就在唐代,人们早就已经把西市看作是胡人集中的地方。最有名的故事见于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俄果获贼。”所以,在“商贾所凑,多归西市”的商人中,就有许多胡人在内。而胡商之外,还有宿卫的质子、禁军的将领、传法的胡僧、跳舞的艺人、当垆的胡姬等等各种各样的胡人。

日本的妹尾达彦教授曾经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描绘出一幅9世纪前半叶长安西市中部地区的局部图像:大街的中央有一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驼队,前面一个胡人牵引着骆驼;对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年轻人,马背上蹲着狩猎用的猎豹——他们是粟特人输入和驯养的;大街上有各色人物,包括来自异国的胡人和僧侣;街道两边的店铺前,有胡姬在招揽生意;也有波斯来的胡姬在与客人调笑……

妹尾教授的这幅杰作应当是非常真实地表现了长安西市的社会风貌,其中胡人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我们把这幅画和《清明上河图》的集市部分相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两者的不同,那就是,虽然都是市场,但《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宋代都市里似乎没有胡商、胡客、胡姬。

汴梁胡人的“消逝”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汴梁这样一座北宋的都城真的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没有胡人

了吗?或者只有作为城市点缀的那样一个胡人了吗?

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后周时期,显德二年(955)四月周世宗规划扩建东京(即汴梁)城的诏书中说:“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这样的表述似乎说明,当时的东京城中外来胡人还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进入宋朝以后,由于西边受到西夏、吐蕃的阻隔,来自中亚的胡人要比唐朝时期少得多了,而从海路来的高丽、东南亚、印度、大食(阿拉伯)人相对于陆路来讲要多得多。然而,来到东京城的外国人主要是使者,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药材等等,入贡于朝廷,宋朝以回赐的方式与之进行贸易。虽然这些使者往往都携带一些属于自己的商品,“私与’商贾牟利”;也有的商人冒充使者,入宋交易;但这种限制在贡赐形式下的贸易,使外来的商人很难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因此我们很少看到东京的市场上有像唐朝西市中那样的胡商,这或许就是《清明上河图》绘制了这样繁华的市场,却没有外来胡商的缘故吧。在记载北宋东京的著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唯一一位属于真正伊朗系胡人后裔的,大概是卷五“京瓦伎艺”条留下的嘌唱弟子之一“安娘”,但她已经不能代表粟特后裔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艺人而已。

邓小南先生在《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宋代初年具有沙陀、粟特、奚等外族背景的军事将领,认为他们“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缘混融关系,长期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共有文化倾向、文化心理,使他们步步融入了中原社会”;加之“宋人观念乃至叙事书写方式的演变”,使得宋代初年以来,胡人的背景似乎已经被世人淡忘,“胡/汉”语境逐渐消解。因此可以认为,北宋汴梁城中虽然生活着一些从五代延续下来的胡人家族,但他们此时已经自我认定为汉人,周边的汉人也毫无疑问地把他们看作汉人,从重文化而不重体质特征来判定民族归属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我们在史料中和在《清明上河图》中很难看到有关胡人的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应当说北宋东京城内原本就有一些胡族居民,同时也一定有随时而来的胡族(主要是指西方来的回鹘、于阗、大食)商人、使臣,但在整个东京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已经不再是都市历史的主角,因此退居到人们视线之外,或者隐藏在画家的幕布后面了。

《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

——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表现真实社会风俗的画卷,那么绘画于图像明显地方的牵驼胡人,是否是宋代都城胡人的真实反映?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胡人并非宋代都市中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个“胡”,与其说是宋代汴梁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唐代长安以粟特商胡为代表的西域胡人的历史记忆。

唐代长安街市中常见的粟特商队在后世的记忆中不仅通过图像显示出来,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记忆也时常用文字表述。如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西游记》,在被学者认为是祖述元代版本的世德堂本第八十二回中,有“祆庙烟沉嘉会空”句。这个“祆庙”,正是唐代来自粟特胡人所传的夷教,而“火烧祆庙”也是元人常用的典故。但是到了明代的李卓吾(李贽)评本,“祆庙”已经改成了后世各本普遍遵循的“佛庙”。这一现在只具版本意义的“祆”字的变迁,其实也表现出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在中古以后的元明之际逐渐湮没的历程。

(注:本报略有删节)